

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张玉春



华文出版社

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玉春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玉春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7

ISBN 7 - 5075 - 1857 - 4

I. 中… II. 张… III. ①古文献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G256. 1 - 53 ②G1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678 号

华文出版社

(邮编: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 @ 263. net

电话:(010)63370164 (010)63370992

新华书店 经销

科普瑞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32 开本 13.75 印张 39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 00 元

《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委 会

主 编 张玉春

**编 委 汤开建 张其凡 程国赋
范立舟 陆勇强 陈文源**

执行编辑 郑可敏 屈文军

前　　言

2004年,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迎来建所20周年华诞。在学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举行了系列的建所纪念活动。12月12日至15日举办的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全国各高校及港澳地区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古文献与传统文化研究之关系展开深入探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将此次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势必对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建所伊始,即服从于把暨南大学建设成为海内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近10年来,又积极主动地贯彻暨南大学实施的“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立足内地,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发掘古代典籍文献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之精华,形成了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古典文献与文化研究、海外及港澳台文献与文化研究三个研究特色,由此构建了本所的总体研究方向——依据古代文献典籍,阐述弘扬传统文化。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展开全方位、多侧面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在国内乃至海外有影响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阵。

近年来,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曾举办过数次国际和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对不断深入地研究古代文献,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承担了应尽的责任。此次在建所20周年之际,我们顺应古籍整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发起举办“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倡

议,得到了全国高校古籍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热情支持,安平秋主任、杨忠秘书长莅临指导;得到了各高校古文献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惠赐论文,阐发宏论。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代文献源远流长,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我们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继续加强与各高校古文献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承担起振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张玉春

2005年3月于暨南园

目 录

《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	赵逵夫 (1)
开展先秦诸子佚说稽考工作	郑杰文 (6)
南化本《史记·秦始皇本纪》疏证	张玉春 (8)
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魏晋著作述略	
——海外汉籍现状实例之一	韩格平 (21)
王若虚对《汉书》的辨惑	杨海峰 (42)
《木兰诗》考证	李中华 余梦远 (54)
黄生《杜诗说》与清初杜诗诠释方法	郝润华 王永环 (63)
宋代的恩赦制度	戴建国 (77)
宋代岭南谪宦表(上)	张其凡 金 强 (92)
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	
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	范立舟 (116)
元代钞法败坏的原因	屈文军 (128)
元代东迁的西域军士	马建春 (136)
关于《韵补》卷首徐藏序的几个问题	骆瑞鹤 王 佳 (161)
日本所见《琵琶记》版本叙录	黄仕忠 (175)
明清时期西洋钟表在广州的传播与钟表业	叶 农 (185)
明清作家生平史料钩沉	陆勇强 (199)
张昱与《可闲老人集》	王 颀 (219)
关于《广东文选》的几个问题	陈广恩 朱巧云 (235)
江藩生平事迹考	漆永祥 (264)

清代越南仕宦李文馥与《镜海续吟》.....	陈文源	(278)
论清代的小说戏曲禁毁运动对三言二拍传播的影响	程国赋	(286)
《华英通语》、《英语集全》与近代南粤对外贸易	严佐之	(295)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	喻遂生	(303)
论古代小说中的佛教文化	曹亦冰	(311)
儒佛道与基督教的人学观念	赵学东 钱国权	(319)
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略论	徐日辉	(328)
中国百年汉文研究之检讨 ——《汉文四科说》为罗著《岭南历史文献概述》作	毛庆者	(345)
民国时期澳门兴起的各项体育运动	汤开建	(351)
简论建国以来东北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李德山	(372)
试论利玛窦的学术传教	顾永新	(385)
马礼逊在早期中英外交关系中的作用初探	陈才俊	(404)
评中译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陈 欣 范立舟	(412)
古籍电子文本全文检索初探	刘韶军	(418)

《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

赵逵夫*

自银雀山西汉墓出土《晏子春秋》简本,《晏子春秋》为伪书之说不攻自破。然而旧题为晏婴所著,绝不可信。无论从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的角度说,此书都是先秦时代一部重要著作,所以究竟其作者或编者为谁,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推断为秦博士淳于越编写,成书于“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但其理由难以成立。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晏子春秋》引诗“和毛诗同一学派”,而“到了毛亨才形成毛诗的一家之学”。但自子夏传诗,受《诗》者众,在先秦时为《诗》学主流。并非从毛亨开始才形成诗本文的面貌及阐释理论。吴先生又因书中写到齐景公饮酒“自鼓缶”,因而断定编者当在秦国。实际上其他地方也有以缶为乐器者,《周易》、《诗经》、《墨子》中均有反映;即使齐地不以缶为乐器,偶尔效秦人鼓之,亦非不可能。况且淳于越本齐人,不至到了秦地,生活意识便能马上变为秦人的,以至于以秦人的观念写齐事。以此而定整个一部书作于秦地、秦朝,殊为牵强。故吴先生观点先在《光明日报》发表(1961. 6. 9),董治安即有《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一文驳之(《文史哲》1962. 2)。董先生主张成书于战国时代,唯未充分讨论具体时间。但稍前高亨先生刊于《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的《〈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一文通过同几种先秦文献的对勘,论定其“作于战国时代”,证据充分,结论可

*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

信。高先生并进一步推断：“齐国威王、宣王、襄王都养士于稷下，人数多至千人，《管子》、《晏子》的写作或者与稷下大夫有关吧？”也很有启发性。

吴则虞先生的结论不能成立，但他对《晏子春秋》一书成书过程的看法更符合该书实际情况。他认为此书有其长时间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原始的素材可能有两类：一类是古书，一类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所以，他虽然认为成书于秦代，但称的是“编写”、“编写者”，而不称“写成”、“作者”。

高、吴、董三位先生在当时情况下不相信柳宗元以来的“依托”说，不相信管同的“六朝人伪造”说，而认真探究其成书年代，各有所得，都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80年代初，谭家健《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晏子春秋〉》一文进一步考证成书于战国中期，主要理由是：从文章体裁看，可能受到《国语》和《春秋事语》的影响；从语言风格看，没有战国后期铺张扬厉的风气；其中有些词汇古奥，当不晚于战国中期（此前孙星衍、高亨已指出这一点）；其事见于《韩非子》等书者，都较《晏子春秋》简略，当是摘自《晏子春秋》，而非相反；从思想观点看，具有战国中期的时代特点。谭先生的论证充分有力，其说可信。

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究竟由谁编写成，至今仍是个谜。

我考证的结果，是由战国中期的淳于髡所编写。

《史记·滑稽列传》所记第一个人物为淳于髡。其本传云：“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史记·孟荀列传》论稷下先生，关于淳于髡云：“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并言齐国人以其与驺衍、驺奭并称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意思是淳于髡善言辞，能谲谏，如润车毂之脂膏，虽不承力，而颇助于成事。结合《孟子》、《战国策》等典籍所载事迹，有以下八点可以断定《晏子春秋》的编者为淳于髡：

第一，淳于髡生活于战国中期，同高、谭等先生所指出《晏子春秋》反映的各方面情况结合。

第二，淳于髡为齐人。又据《水经注·淄水注》，晏婴葬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以东）城北门外东北故宅，而《太平寰宇记》卷十九载淳于髡死后葬淄州淄川县（今淄博市以南）东六十七里。看来淳于髡故乡去晏子故宅不是很远（古人死后葬归故里）。那么，淳于髡不但认晏子为故国先贤，而且生长在有关晏婴的民间传说最多的地带，主观上、客观上都具备收集晏婴言论、事迹、故事的动因与条件。

第三，《史记·田完世家》载驺忌以鼓琴见威王，“驺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曰”云云。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驺忌见齐威王在威王初年。《田完世家》又言淳于髡在齐宣王时为稷下大夫，《战国策·齐策三》亦载“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从威王元年至宣王元年计37年，则淳于髡在齐国前后约40年（据《孟荀列传》，其间曾至魏国，魏惠王欲以卿位待之，髡谢去）。《战国策》、《史记》等书多记其谏说齐王事。本传言齐威王“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则淳于髡同齐国的国君、宗族、卿大夫接触方便，对齐国历史和朝廷的情况十分了解，也有机会接触齐之佚文旧典、与闻前朝故事，收集到有关晏子的文献，整理、加工起来也很方便。

第四，《史记》本传中言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而淳于髡以讞说之。看《晏子春秋》中很多篇所反映的齐国历史，同齐景公时情况不完全相合，倒同战国田齐威王时情形相似。据《左传》及《史记·齐世家》载，齐景公时主要问题是田氏专权，及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利。而《晏子春秋》中反映最突出的是齐王的好为淫乐和长夜之饮及百官荒乱之类。只看卷一开头几篇题目：《庄公矜暴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第三》、《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第四》、《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第五》、《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谏第六》、《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第七》、《景公信用谄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再看其中晏子谏语的措辞，如“自奋乎暴力，不顾乎行义，暴力之士，无忌于国，立身威强，行本淫暴，贵戚不荐善，逼迩（按指亲近者）不引过，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

行。用此存者，婴所未闻也”（第一篇）；“今日饮酒，而三日寝之，国治怨呼外，左右乱乎内。以刑罚自防者，劝乎为非；以声誉自劝者，隋乎为善；上离德行，民轻赏罚，失所以为国矣。愿君节之也！”（第三篇）逐篇翻阅，大部分同齐威王时形势相合。看来，《晏子春秋》一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是一部为当时现实服务的书。单从文学的方面来说，也表现出编者明确的编写意识。从各种史书所载齐威王时人物看，其编者只能是淳于髡。

第五，《史记·田完世家》云：“威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又《说苑·尊贤》记淳于髡事，称之为“博士淳于髡”，则淳于髡威王时为博士（许慎《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馆”），于宣王时为上大夫，但无专门政事，以著书议论、整理文献为务。则淳于髡有充分地搜集整理晏婴言论和有关文献，编订有关晏婴佚闻故事的时间和条件。

第六，《孟子》、《战国策》、《史记》等书籍所反映的淳于髡思想与晏婴接近。如劝君节俭、勤政、明赏罚，反对儒家的葬仪礼教等。其中有些篇章，似乎就是淳于髡的事情，而借晏子写出。如《史记·滑稽列传》记威王置酒后宫，召髡赐酒，问“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有一通言辞其中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且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三）。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灭烛，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齐王闻之而罢长夜之饮。这同《晏子春秋》中一些篇章所写颇为相近。

第七，史载淳于髡“其谏说，慕晏子之为人”。从文献中所载的行为、作风看，他善于揣摩君王心理，婉转谲谏。这同晏婴“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管晏列传》）的思想作风相近。他们都力求正道直行，但在君王专制的制度下，又不能不同时明哲保身。他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地位不同、面对的君王不同，也与其阅历、性格有关，但其共同特征是明显的。

第八,一个人以某人为题材写作,或留意收集某人的材料,主要是因为思想上接近,称赞其为人,但有时其动因也很复杂,有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原因,也可能会成为采取某一行动的原因。淳于髡同晏子在生理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矮子。晏子“长不满六尺”(《管晏列传》),淳于髡“长不满七尺”(本传)。此周尺也。以今日长度言之,晏子不足1.38米,淳于髡不足1.60米。淳于髡在齐国朝堂及稷下学宫活动,缺乏魁梧的体貌,自然是一大缺憾;但他让人们将他同晏婴联系起来,则在人们心理上的反应就会完全不同。今所知春秋战国时代齐国人物,只有淳于髡同晏婴在这一点上一致。再者,田齐标榜承姜齐正统,在对待姜齐时代的明君贤臣上,更倾向于对贤臣的鼓吹。淳于髡搜集晏婴的佚文、言论、史料、故事,汇编为书,既是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的一种肯定,也是塑造自己“政治形象”的一种手段。从这一点说,战国中期善于言辩的齐国土人中,只有淳于髡对晏子的事迹言论会有更大的兴趣。

从以上八个方面来看,《晏子春秋》一书是战国中期齐人淳于髡在齐威王、宣王时期搜集晏婴的佚著、言辞、事迹及传说故事编成,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别人的言辞或事情,传说中集中在晏子身上,有的地方也体现了淳于髡个人的经历、思想与情感。此书的成书过程及性质比先秦时其他著作更为复杂,但题作“淳于髡编”,应无问题。

开展先秦诸子佚说稽考工作

郑杰文*

由于私学形成特别是孔子创立学派、新立学说的带动，战国诸子各自立说创派，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对中国思想史进程和后世政治、经济、军事等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最为宝贵的思想文化结晶。这些思想，有的被弟子门人记录成书，有的自己著书立说，有的因他人与之诘辩或引用而被保存在他家著述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先秦诸子文献。但其后由于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焚毁咸阳，以及后世战火、天灾等原因，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料被完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百不剩一，使我们难以详细了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诘辩的全貌，使我们难以全面掌握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内容，令人扼腕叹息！

所幸有一些流传至今的先秦两汉典籍，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盐铁论》、《论衡》等书中，保存了某些他家诸子的思想佚说，近些年的考古遗址中更出土了一些汉后未见的先秦文献，使我们可以部分窥见这些先秦诸子佚说的面貌，部分了解战国诸家的争辩佚题。如，以《庄子·则阳》“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荀子·成相》“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季、惠、宋、墨皆画策也”诸说为线索，参考《吕氏春秋》之《喻大》、《务大》、《有度》诸篇论说（陈奇猷考其中有季真派

* 郑杰文，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学说),可考稽战国季真学派之“去私论”等佚说。又如,通过考察《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慎子》(真伪待考)等所载,钩稽告子“自然人性论”、孟子“社会人性论”及“性善论”、慎到“人性自为说”、荀子“性恶论”等,可钩稽战国中后期颇为兴盛的“人性之辩”这一学术争辩佚题。这样,才可深化对战国诸子的研究,尽可能完整地掌握战国思想学术全貌。

故我们计划从可靠先秦两汉传世典籍(我们的《两汉全书》已近竣工)、出土文献、石刻文献中,分家钩稽先秦诸子佚说。

此课题的主要难点有以下两点:

第一,对所钩稽之各家诸子佚说的分辨和归类。先秦两汉人在引他家学说时,多不注明作者。这就需要分辨。而分辨的关键在于掌握诸子佚说的主旨。好在某些先秦两汉典籍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及《解蔽》、《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中,已有对各家学说主旨的论说,可为我们提供某些线索。

第二,某些诸子佚说载体如《列子》、《慎子》、《尹文子》等典籍需要辨伪。好在前人已做了诸多基础工作,如姚际恒、张心激、郑良树等有辨伪著述,如洪迈《容斋随笔》、纪昀等《四库提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等总结了各种辨伪方法;并且我们自己也在考辨《穆天子传》、《鬼谷子》等书时积累了某些实践经验。另外,有诸多出土文献、石刻文献可供参照。

最后,整理出一部多卷本的《先秦诸子佚说钩沉》,以较为系统地重现先秦诸子佚说,再现战国某些久未被人关注的论辩课题,考证出一大批前人较少关注的先秦诸子论说,以深化和扩展战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研究。

南化本《史记·秦始皇本纪》疏证

张玉春*

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是第一部《史记》三家注合刻本，至今仅有一部全本存世（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七十二卷的残本），藏于东京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是为稀世之珍。更为珍贵的是，黄善夫本传入日本后，经五山学僧幻云（1460—1533）改装，在天头地脚及左右栏外抄入了大量的日本学者如藤原英房（1292—1348）、室町中期南禅寺听松院的僧人灵元、室町后期的桃源瑞仙（1430—1489）等人引用相关文献在其他本《史记》上所做的眉批、夹注，同时，幻云根据当时所见《史记》异本和相关典籍，也在此本上作了许多批注。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所引《史记》异本及典籍资料今基本亡佚，即使是流传至今的典籍，文字与今本也多有不同。幻云去世后，此本流入妙心寺和尚南化玄兴（1538—1604）之手，因其为南化玄兴所藏，故日本学者将这些批注与黄善夫本相区别，称其为南化本《史记》。

南化本所载大量批注，文字量几占《史记》的三分之一。因黄善夫本为世间孤本，学者难能一见，而条理、考证幻云等人所作批注，将之公布于世更非易事。目前国内的《史记》研究及据《史记》进行古代历史、社会的研究，若没有新材料的发现，已很难有大的进展。日本著名学者水泽利忠于1957年—1961年出版《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曾引用了一些南化本的资料，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由此也推动了《史记》及

* 张玉春，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教授。

相关学科的研究。但是，水泽利忠所引仅是南化本中极少一部分，而且罗列异同多，明辨是非少，南化本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这固然是因为南化本难于疏理所致。所以，水泽利忠后来不无感慨地说：“本书的资料今后若经众多研究者得以研明，将是对学术界的贡献，也意味着对先辈学者学德的报恩啊！”但水泽利忠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时至今日，南化本《史记》的原貌尚未为学者所知，这不能不说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憾事。本人1994年赴日本作访问学者时，曾目睹此本，虽仅仅观验了版本形态，但已为此本所载的丰富资料所折服。1997年因撰写《〈史记〉版本研究》，再度赴日，经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尾崎康先生的帮助，曾得以获许引用少许资料。1998年，东京汲古书院将黄善夫本《史记》影印出版（12巨册），南化本的资料也随之公布于世。但是因此本字体行、草相间，中国汉字与日本汉字混合使用，加之典籍方面的障碍，学者还是难以利用。于是本人向教育部古委会申报了《南化本〈史记〉疏证》课题，获准立项。经过三年工作，已将南化本疏理清楚。该项目的完成，我更惊叹此本资料之珍贵，今择其要公布南化本“疏正”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六

1. 秦襄王为秦质 《正义》曰：“质言致。”于赵。
2. 生始皇，始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于赵。
3. 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宛，於袁反，有郢。
4. 蒙骜 骜，五高反，又五到反。《通鉴》胡注：“骜，五到翻。” 王翦、廉公等为将军。
5. 元年 幻语：“元年乃即位明年也。”疏证：幻指幻云。 将军蒙骜击定之。
6. 二年，《通鉴》第六：“廉公将卒攻卷。”胡注：姓名。’廉，悲骄翻。将，即亮翻，又音如字。卷，遂员翻，邑名。”“索隐曰：‘廉，邑名。廉公，史失其卷，邹丘全反，一作权。疏证：邹指南齐邹挺。’ 廉公将卒攻卷。
7. 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类篇》胡注：徐广音场，《索隐》音杨，生《史记音义》。疏证：徐广音场，《索隐》音杨，又直亮翻，仲郎翻。 晏
8. 蝗虫从东方来，敝天。天下 一本，天下之下有“大”字。家本，无“大”字。蝗，胡孟反，又音皇。 瘦。